

一、西藏抗爭事件及其後續效應

企劃處主稿

西藏拉薩於今年3月14日爆發大規模抗議事件，中共出動軍、警強力鎮壓，國際輿論同聲撻伐。

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誤植照片的報導、CNN主持人卡提佛的言論，引發中共文宣反制、點燃中國大陸民眾民族主義怒火。

事件發展的後續效應仍待觀察，惟若中國大陸民族情緒未獲控制，恐將影響中國大陸內部穩定與對外關係；且此次民族情緒透過網路串聯之快恐使中共更加嚴密地封鎖言論與新聞自由。

（一）西藏抗爭事件源起與中共處置作為

今(2008)年3月10日，西藏拉薩市藏人為「西藏抗暴事件」(1959年3月10日，中共解放軍鎮壓抗暴西藏民眾，藏人死傷嚴重，達賴喇嘛和數萬藏人流亡國外)舉行遊行抗議，卻因中共軍、警強勢介入，於3月14日引爆大規模抗議事件，範圍除西藏外，並擴及青海、甘肅、四川，是繼1989年的「西藏抗暴日」後藏人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

中共在第一時間出動軍警強力鎮壓、封鎖消息、驅逐記者、禁止外人進入西藏、管制相關報導與封鎖網站、網路搜尋引擎，定性事件為「西藏一小部分人的『打、砸、搶、燒』行為，將矛頭指向達賴，指其企圖謀求西藏獨立、破壞北京奧運；另指責西方媒體對「314事件」的報導失實，不斷重申處置過程依法、克制、絕未開槍、絕無出動坦克，並強調有能力平息事件，以防止事態持續擴大。

（二）國際社會的反應與態度

中共雖在第一時間封鎖相關消息，但其鎮壓行動的畫面仍不斷透過手機簡訊與網路傳送出來，西方主流媒體(如華爾街日報、華盛郵報、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等)、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無疆界記者組織、人權觀察組織等)及各國(包括聯合國秘書

長、歐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義大利、瑞士、瑞典、波蘭、教廷、澳大利亞等)領袖或外交部門均對此事表達極度關切，譴責中共違反申奧承諾，要求中共自制及與達賴對話，並有部分國家政要(聯合國秘書長，加拿大、波蘭、斯洛伐克總理，巴西、捷克、愛沙尼亞總統，德國總統與總理，英國首相級王儲，日本皇室)表態不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歐洲議會(呼籲歐洲共同體27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以及所有的政治人物抵制北京的奧運會、不出席開幕式。自由亞洲之聲，2008.4.12)及美國參、眾議院(譴責中共在西藏行使暴力，呼籲中共與達賴喇嘛對話、實踐承諾讓國際媒體自由採訪，北京應提供西藏抗爭事件後，死亡藏人與遭拘留人數。中央社，2008.4.10)通過涉藏決議；奧運聖火在境外傳遞過程中亦頻遭藏人、維權人士阻撓。

面對國際強大的輿論壓力，中共不斷透過外交管道尋求支持，並宣稱已有近130個國家表示理解與支持其在西藏問題的立場與處置方式(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3.26)。

(三) 後續發展及中國民族主義的激化

中共在「314事件」後隨即展開強力文宣，並針對部分西方媒體(美國CNN、德國RTL電視臺)資料引用不當、誤植照片，指責係刻意歪曲、污辱中國人民，並抗議各國違背奧運精神、干預中國內政、挑釁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而CNN節目主持人卡佛提(Jack Cafferty)的言論(「中國過去50年來仍是那一群蠢蛋與暴徒」)更激起中共官方及中國大陸人民怒火。

中國大陸境內與海外民眾除抵制西方貨品、展開「反西方，護奧運」抗議遊行外，也透過網路迅速串連反西方情緒。MSN(MSN Messenger，網路通訊系統)中國大陸網民自發性發起「紅心 CHINA」(愛中國)、「QQ 騰訊」(網路即時通訊系統)用戶發起將顯示照片換為中國國旗與虛擬聖火傳遞、新浪網站發起「反分裂、護聖火」連署等活動，均獲得數百萬甚至千萬網友響應，中國大陸青年的民族情緒空前高漲。

國際社會對此波中國大陸人民的民族情緒，認為係中共點燃與刻意縱容所致(美國新聞週刊，2008.3.29；紐約時報社論，2008.4.9；洛杉磯時報，2008.4.19；法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4.18)，並擔心民族主義一旦無限上綱，可能導致中國大陸青年對西藏持偏頗看法(美國新聞週刊，2008.3.29；法國國際先趨論壇報，2008.4.18)、無法容忍異見(美國新聞週刊，2008.3.29；日本產經新聞，2008.4.22)以及敵視鄰國(自由亞洲之聲，2008.4.19；法國國際先驅

論壇報，2008.4.18)的負面影響，不利中國大陸言論、新聞、宗教、文化自由(紐約時報社論，2008.4.9)；對外則會因排他性而敵視鄰國，使中共面對國際採更加强硬的態度而悖於「和平崛起」口號，不利中共外交(美國外交關係協會，2008.4.23；日本產經新聞，2008.4.19、2008.4.20、2008.4.22；星島日報，2008.4.16)。更甚者，認為若民族主義激化且中共處理不當，恐使中國大陸民眾將不滿情緒轉向胡錦濤，危及中共政權(日本產經新聞，2008.4.20)。

目前，中共當局雖已透過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媒試圖降溫，呼籲民眾理性表達愛國熱情，但批評達賴、主張中共始終有效管轄西藏報導依舊不斷。

(四) 結語

1. 去(2007)年中國大陸外銷產品品質受到國際質疑與譴責，中共官方即曾以國際妖魔化中國產品反擊。隨著北京奧運會期程逼近，國際間對中國大陸人權問題、食品安全衛生、空氣污染、達佛政策等批評聲浪更漸高漲，而西藏抗爭事件更使得中國大陸瞬時成為國際關注及批評的焦點。面對接踵而至的壓力，中共為了為其政策作為辯解，不惜高調抨擊西方國家與媒體，間接的挑動中國大陸民眾排外情緒。近期中共雖已試圖降溫，但其內部的民族情緒若無法如其所願的收放自如，恐將影響內部穩定與其對外關係。
2. 中國大陸民族情緒雖受到中共當局的文宣影響，但其確屬於「由下而上」的自發性行動，過程中也反映出手機與網路對於凝聚民眾意識的影響力；而此次民眾透過虛擬世界串連的成效恐會引發中共的危機意識，未來中國大陸的網路與通訊自由或將遭遇更嚴密的監控。
3. 中共為掌控情勢封鎖訊息的作法，加上長期以來管制媒體、隱匿事實(隱瞞 SARS、愛滋病、禽流感等疫情事件)、壓制西藏宗教自由等作為無法取信於國際，實係西方媒體報導錯誤的根由，如要避免類似情況發生，開放言論與新聞自由恐是中共較正確的應對方式。而中共派出統戰部副部長層級官員於5月初與達賴特使在中國大陸深圳舉行會談，也適度回應世界各國要求中國政府維持與達賴對話，以緩解外部之壓力。

二、中國大陸 2008 年第 1 季經濟形勢

東華大學高長教授主稿

中國大陸 2008 年第 1 季經濟景氣略有過熱回溫跡象，惟固定資產投資成長及物價水準上漲趨勢並未緩和，整體而言仍未脫離過熱軌道，未來幾個月持續存在偏熱危險。

人民幣兌美元快速升值，不僅使中國大陸現有外匯儲備遭受鉅額匯兌損失，且不利於商品出口，同時加劇炒作人民幣的獲利預期，熱錢流入增加了中國大陸貨幣市場的不確定性。

4 月中旬，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第 1 季經濟運行概況，顯示中國大陸宏觀經濟形勢仍然偏熱，換句話說，近來中國人民銀行頻頻採取以從緊的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並沒有使得過熱的經濟情勢明顯扭轉，反而是物價水準不斷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大增。

(一)經濟過熱略為降溫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第 1 季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 61,491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較上年同期成長 10.6%，漲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1 個百分點，是 2006 年第 2 季以來成長率單季最低水準。這樣的結果，符合宏觀調控的預期。不過，第 1 季經濟成長速度減緩，是否為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實施後收到的效果，各界仍有所存疑，因為今年初中國大陸出現歷史上罕見的雪災，同時，國際次貸危機蔓延對中國大陸外需擴張影響加深，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帶來負面影響。

再從貨幣金融面觀察，中國大陸經濟景氣過熱回溫的跡象似較明顯。根據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第 1 季貨幣供應量增速已略有回落，3 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較上年同期成長 16.3%，漲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 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和流通中現金(M0)的成長率分別為 18.3%和 11.9%，漲幅較上年同期分別下降了 1.6 和 5.6 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機構各項貸款較年初增加 13,326 億元，較上年同期少增 891 億元；而各項存款增加 26,353 億元，多增 7,606 億元；第 1 季貨幣淨投放 58 億元，較上年同期少投放 258 億元。

另外，中國大陸第 1 季進出口總值 5,70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4.6%，漲幅較上年同期高出 1.3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值 3,059 億美元，成長 21.4%，漲幅較上年同期回落 6.4 個百分點；而進口值 2,645 億美元，成長 28.6%，增速高於上年同期 10.4 個百分點。貿易出超 41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49 億美元，下降 10.6%。在去年以來一系列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加上國際經濟景氣下滑導致外需減弱，貿易不平衡狀況似有改善。

(二)通貨膨脹問題惡化

儘管如此，一般認為，第 1 季中國大陸經濟的表現仍未脫離「過熱」的軌道，最主要的理由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成長和物價水準的上漲趨勢並沒有緩和下來，尤其通貨膨脹的壓力甚至較過去大為增加。

中共國家統計局對今年第 1 季固定資產投資的整體表現，以「平穩增長」來形容。然而，我們發現，第 1 季中國大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21,845 億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4.6%，漲幅較上年同期高出 0.9 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較上年同期成長 25.9% 和 18.3%，漲幅較上年同期分別增加 0.6 個和 1.6 個百分點。尤其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開發投資繼續呈現高度成長(成長率 32.3%)，較上年同期漲幅高出 5.4 個百分點。這樣的表現以「平穩增長」形容，似乎不切合實際。

另外，第 1 季的居民消費價格水準(CPI)上漲 8%(其中 2、3 月份分別上漲 8.7% 和 8.3%，創 11 年來新高)，漲幅比上年同期高出 5.3 個百分點，其中，城市和農村地區的 CPI 分別上漲 7.8 和 8.7%。同時，商品零售價格水準今年第 1 季也比上年同期上漲 7.4%，漲幅也比上年同期高 5.3 個百分點，這種現象顯示，中國大陸的通貨膨脹壓力，並沒有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之下得到有效的控制。從去年 7 月份開始，中國大陸的 CPI 上漲率就超過 5

%，嗣後就呈現步步高的走勢，分別是超過 6%、接近 7%和達到 8%。中國大陸 CPI 漲幅不斷創新高，既有需求拉動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動的原因，前者主要是流動性過剩、信貸膨脹所引起，後者則是來自於工資成本、原材料、國際大宗物資及油價上漲等因素。

(三)人民幣匯率加速調整

就中國大陸經濟在第 1 季的整體表現來看，尚有若干現象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一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趨勢。今年第 1 季，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步伐明顯加快，中間價格升值幅度達 4.07%，3 個月的升幅分別為 1.7%、1.1%、1.3%，遠超過 2007 年每月平均升幅 0.6%，2007 年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幅度僅為 6.9%。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加快主要是由於美元貶值所導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相對於歐元和日圓的比率，在今年第 1 季卻分別貶值 3.74%和 8.75%。中國人民銀行宣稱，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整，理論上，歐盟和日本都是中國大陸主要貿易夥伴，歐元和日圓在一籃子貨幣中的地位應相當重要，人民幣兌歐元和日圓比率雙雙下調，令人不解。人民幣兌美元大幅升值，不僅使中國大陸現有的外匯儲備遭受鉅額匯兌損失，而且也不利於商品出口。

第二是人民幣快速升值，加劇了炒作人民幣的獲利預期，熱錢流入增加導致中國大陸貨幣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迄今年 3 月底，中國大陸外匯儲備累計已達 16,822 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1,539 億美元，扣除外貿順差 414 億，實際使用外資(流入)274 億，第 1 季外匯儲備餘額淨增加 861 億美元，這部分淨增加的外匯儲備幾乎可以認定是「熱錢」，若再考慮中國大陸對外投資造成資本流出的金額，流入的「熱錢」肯定不只 861 億美元。

第三是股市大起大落現象。股價指數從 2,100 多點上漲至 6,100 多點。去年 10 月間又從 6,100 多點下跌到今年 4 月初的 3,200 多點，區間的波動都只經歷了很短的時間，股市大漲大跌與經濟的基本面缺乏邏輯聯繫，顯示中國大陸股市的投機性過大，在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情

況下，加劇了金融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給國際熱錢炒作提供了舞臺。

第四是房地產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突出。今年第 1 季中國大陸房地產投資繼續成長 32.3%，漲幅明顯高於上年同期，房屋銷售價格繼續上漲(第 1 季，中國大陸 70 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 11%)，但是同期房屋的銷售面積卻呈現下降趨勢。這種現象顯示中國大陸房地產業存在泡沫化問題。在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及預期升值)，以及鋼材、人事成本快速上升的情況下，未來房價繼續上漲的壓力有增無減。

(四)經濟過熱問題將會持續

總之，中國大陸宏觀經濟偏熱的現象仍然沒有消除。中共國家統計局在 4 月底公布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第 1 季為 113.3，宣稱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不過，從景氣預測的領先指標來看，今年第 1 季的領先指數為 103(以 1996 年為基期)，比 2 月份高出 0.32 個百分點，且是連續第 3 個月上升，意味著未來幾個月中國大陸經濟還有走向偏熱的危險。未來在「奧運經濟」及中共「十七大」後新人事布局的主導下，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景氣熱度向上提升的力量可能勝於向下調整。中國人民銀行可能已體認到經濟情勢之嚴峻，在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第 1 季度經濟數據後，幾乎是同一時間就宣布再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這已經是今年第 3 次，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已達到 16%)。

三、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近期訪問中國大陸

企劃處主稿

4 月 1 日至 3 日，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訪問北京，與中方討論雙邊各項重要的經濟、金融與環保問題及西藏情勢、人權狀況，並為今年 6 月在華府召開的中美第 4 次戰略經濟對話熱身。鮑氏此行正值中共新領導班子就職之際，且為 3 月西藏抗爭事

件以來，第 1 位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高層官員，為近期雙邊之重要會晤，受各界矚目。

鮑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講，環境保護為主要內容，顯示環保合作在未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的分量越來越重。

（一）背景說明

1.2006 年 12 月 14 日於北京舉行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過去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鮑氏的對口中共官員為已卸任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鮑爾森此行會晤接替吳儀成為中美談判的中方代表新任副總理王岐山。據媒體報導，鮑爾森與王岐山之間的交情甚厚（早於王岐山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時，已聘美國高盛為重組顧問，而當時高盛董事局主席即為鮑爾森。兩人在 2003 年 SARS 爆發期間就有過合作，為證明北京當時是安全的，時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請鮑爾森對北京做 1 次公開的訪問。2006 年 9 月，鮑爾森第 1 次以美國財政部長的身份訪北京時，也曾與王岐山舉行會談。鮑爾森還曾在華爾街日報評價王岐山是個非常有能力的人。工商時報，2008.3.28）。此次會晤，為鮑氏和中共新任領導階層會面，關乎雙方新關係的建立，有其重要性。

2.依照往例，過去鮑氏數次訪中，人民幣均加速升值，此次在鮑氏訪問北京前夕，3 月 27 日人民幣兌美元匯價為 7.0130 元，突破 7.02 元關口，再創匯改以來新高。

3.前 3 次對話情形：

(1)第 1 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006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美方促請中方推行各種改革（鮑氏提出包括以放鬆匯率管制作為第一優先要務，及中國大陸侵犯版權現象猖獗、持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等其他重大問題）。但中方則表示，雙方在對話中達成了相當多的共識，但也有很多歧見。此次對話，雙方同意採取措施以處理貿易失衡問題，包括鼓勵美國提高國民儲蓄率，並擴大中國大陸的消費規模和匯率彈性。

(2)第 2 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在人民幣匯率和貿易逆差等問題上，仍各持己見（美方對人民幣匯率的改革不滿，認為速度太慢。中方雖然同意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但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方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改革匯率機制）。對於中方要求美國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美方並未同意。美方指中國大陸出口食品的安全問題，已對兩國間的「信心」造成打擊，中方則同

意加強監管。

(3)第3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在人民幣匯率和貿易逆差等問題上，仍各持己見(美方表示之所以聚焦於人民幣匯率，是因其是市場改革的指標。如果中國大陸改革步伐太慢的話，美國將繼續敦促中國大陸加快步伐；中方則認為人民幣升值已足夠，反對超出中國大陸承受能力的過快升值)。雖然中方在匯率問題上未讓步，但承諾會進一步向外國企業開放金融市場；開放外國企業在中國大陸上市籌資，被視為一重大進展；在貿易平衡方面，中方仍持美應售中高科技的一貫看法，美國政府則表達不支持保護主義的做法及增加法規障礙來保護國內產業立法之立場。此外，中美兩國並將在能源和環保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建立工作組，研究為期10年的能源和環保合作規劃)。3次對話雙方雖達成若干共識，但歧見仍多。

(二) 訪問重點

鮑氏此行，會晤中共高層(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副總理王岐山、外長楊潔篪等)，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

1. 重要談話

鮑爾森表示，美方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持外資開放政策。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成功的，且取得進展。期待第4次戰略經濟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和互信，確保兩國經貿關係和整體關係穩定發展。美國金融市場的亂局亦為雙方討論之議題。中方則強調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成功進行3次，取得積極成果(胡錦濤、王岐山)。積極評價中美經貿合作和兩國關係的進展(中方願與美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加強對話與交流，增進戰略互信，妥善處理有關敏感問題)，中方願意與美方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協調，提升雙方經貿合作水準，為保持全球經濟成長、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共同努力(胡錦濤)。在當前形勢下，戰略經濟對話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雙方應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堅持對話全局性、戰略性和長期性的定位，切實發揮對話的平臺作用)，今年6月第4次戰略經濟對話，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爭取對話取得積極務實的成果(王岐山)。

在西藏問題方面，鮑氏表達對西藏抗爭事件的關切，並呼籲透過

對話和平解決。中方闡述拉薩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的性質和真相，及中國政府有關原則立場(中國政府依法採取的措施，不僅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而且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中方希望美方認清達賴分裂集團的真實面目，理解和支持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正義立場。楊潔篪)。

2.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講題：「迎接挑戰：能源與環境的合作夥伴關係」)

(1) 人民幣正在顯著加快升值，並且該繼續。

如果人民幣匯率不能反映經濟基本面，對中國大陸將是危險的。迄今為止，人民幣升值是有益，有利於抑制通貨膨脹，沒有跡象顯示人民幣升值損害中國大陸經濟。同時，更靈活的匯率機制，也是間接增加中國大陸國內消費的強有力工具。

(2) 指中國大陸環境污染嚴重。

中國大陸面臨巨大的環境挑戰(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 20 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大陸占其中的 16 個)，中國大陸正在追趕美國，成為世界頭號溫室氣體排放源。並指出，中共能源限價政策的不當。中美第 4 輪戰略經濟對話，雙方將圍繞「可持續經濟成長的願景」，就可持續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和環境品質間保持均衡發展的問題展開討論。在能源價格方面，呼籲中共讓市場自由化。

(3) 呼籲中共解除對環保科技的進口障礙。

採納先進科技將提高中國大陸的能源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有害的污染物。但是將這項科技引進中國大陸，卻受阻於中共對環境商品和勞務所設置的高關稅和非關稅障礙。

(三) 研析意見

在中共新一屆政府人事底定後，鮑氏即訪中，顯示美方對雙邊經貿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重視。近來中美經貿互動，一方面美方持續以人民幣匯率造成不公平競爭為由，要求中共提升人民幣匯率；另一方面，中共總理溫家寶也曾對美元貶值與美國次貸危機後的經濟表現表示擔憂。雖有評論指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實質成效甚微，然以雙邊經貿問題之複雜性及結構性矛盾，中美經貿對話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相對突出，今年3月29日美國「中國事務以及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特使」

霍莫即表示，鼓勵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密集對話(例如戰略經濟對話，以及鮑爾森與國際貨幣基金和其他組織的會談)；並與中共就敏感議題進行對話，以對抗美國國會議員採取懲罰中國大陸的行動(中央社，2008.3.30)。尤其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屆，雙邊經貿關係更具敏感性，未來雙方經貿對話之可能發展對雙邊經貿互動影響，更值關注。

此外，面對全球暖化及中國大陸對資源的需求增加的情況，在第3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中美即探討加強能源及環境合作，並具體規劃未來10年雙方在此領域的合作內容；此次鮑爾森訪中，行前美國財政部表示，保護環境與促進乾淨能源為雙方共同優先議題。鮑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講，環境保護亦為主要內容，顯示環保合作在未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未來雙方在此領域之互動及可能影響，值予持續觀察。

四、中國大陸社會抗議的性質和趨勢

中央研究院陳志柔副研究員主稿

當今中國大陸的集體抗議，絕大部分是特定群體因為自身利益受損，走投無路下的維權行動；其次是城市居民保護自身環境、或抗議政府執法不當的集體抗議；第3類則是民族主義情緒下的反帝國主義行動。

社會抗議的3大群體，一是城市改制企業職工；二是農村失地村民；三是城市拆遷居民。2005年起，新興抗議群體包括：外資企業農民工、民辦學校及高校的大學生、城市特定職業群體、及城市中產階級市民。

絕大多數群體抗議的訴求都是針對群體自身的經濟利益，很少是有關公眾利益或普世價值的議題。但近兩年來，後者數目明顯遞增，且帶有極強的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傳播效果。

群體抗議未必立即危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但數目逐年增多，

個別抗議事件的參與人數也快速膨脹，不可確定性隨之增高。尤其當股市下跌、房價過高、物價膨脹時，城市白領市民心生怨恨，群體騷動失控的可能就會提高。

群體抗議利用有限開放的政治結構、媒體報導和網路空間，已經成為政治過程的一部份；它們參與了國家部門機構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角力和利益競逐，構成新一輪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當今中國大陸的集體抗議，以數量比例而言，首要是特定群體為了自身利益受損的維權行動，如改制企業職工、外資企業工人、拆遷居民、失地農民等；第 2 類是城市居民保護自身居住環境，或抗議政府執法不當的集體抗議，如廈門反 PX 項目及上海反磁懸浮延長線的行動；第 3 類則是民族主義情緒下的反帝國主義行動，如近日多個城市民眾到家樂福前示威反法國。這些集體抗議行為，未必直接挑戰中共黨國體制的合法性，但已經彰顯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正進入新的互動階段。

分析當代中國大陸的社會集體抗議，必須從有限的資料提煉有用的訊息。以新聞報導而言，1997 年至 2007 年之間，關於中國大陸社會集體抗議的新聞，逐年增加，共計 1 千餘個事件。考量中國大陸的媒體管制和國家規模，1 千餘件群體抗議事件當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藉由深入的貫時性分析，的確可以勾勒出 10 年來社會抗議的變遷和趨勢。

（一）群體抗議的行動者、議題、動員

分析群體抗議，首要問題不外「誰在抗議？」及「為什麼抗議？」。從 1997 年到 2002 年間，社會抗議的兩大源頭，一是城市改制企業職工為了下崗待遇、工資及退休金，走上抗爭之路；二是農村村民為了土地徵收及稅費問題，槓上貪腐幹部及地方政府。2003 年以來，城市被拆遷居民集體抗爭的事件急遽增加，雖然 2004 至 2006 年間有所減緩，但 2007 年起，拆遷抗議事件又另起一個高峰。此外，2005 年起，

新興抗議群體逐漸成形，包括：外資企業農民工、民辦學校及高校的大學生、城市特定職業群體(如教師、職業司機、退伍軍人)、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為了自身生活條件的公眾議題抗爭。

集體抗議的訴求，反映社會衝突的性質和解決之道。例如，訴求是針對抗議者的小群體利益，還是公眾利益？抗議者要求的是經濟利益分配、還是政策措施改變？解決方案是一次性補貼、還是修改遊戲規則？截至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群體抗議的訴求都是針對該群體的經濟利益受損，如工資、補償金等，有關公眾利益或普世價值的議題，並不常見。以近3年的事件分類次數分配為例，訴求公眾利益的事件，約為當年度所有抗議事件的1成左右。2007年發生的340件集體抗議的新聞事件中，243件(占71%)訴求自身群體利益，僅僅46件(占14%)訴求公眾利益。

雖然以公眾利益為訴求的群體抗爭比例仍低，但從2005年起，這類事件顯著遞增，且它們的影響力和傳播效果，遠高於其他小群體抗議。例如，2007年廈門反PX項目的遊行，及上海反磁懸浮延長線的聚眾散步，都是以環保公害為訴求，打動中產階級市民的心，抗議成員利用網路社群和手機簡訊進行訊息交流、議題辯論，從而擴散動員、集結群眾。又如，2008年4月，多個城市爆發抵制家樂福的反法示威，也是源於網路論壇的討論動員。

公眾議題升級成為群眾集結事件的動員過程中，網路論壇和手機簡訊成為重要的媒介平臺。環保公害的訴求能在當地城市的網路社群中得到共鳴，成功帶動集體行動；源於民族主義情結的愛國行動，也多能成功地透過網路迅速集結人氣。

(二) 群體抗議的制度形成及政治風險

表面上看來，群體抗議雖然頻率遞增，但同病相憐的小群體之間缺乏橫向連結，無法跨界動員、經驗傳承；拆遷、徵地、拖欠工資等特定訴求，較少引起普遍大眾的同情聲援；往往抗議訴求最終可以用經濟補償來弭平。因此，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反而群體抗議演變成爲

人民的另類發聲方式，是體制外的討價還價，成為解決人民與政府爭議的 1 種新制度模式，也成為中央監管地方的 1 個指標。

群體抗議事件的矛頭至今多為特定的官員、企業或機構，頂多是特定地方政府新措施，不是針對包庇貪官的上級政府，也少有人追究違法亂紀背後的制度成因。中央政府至今仍扮演爭議仲裁的角色，是不肖官員的剋星，是人民的希望所寄。其實，當今群體抗議的種種訴求，追根究底都是源於當今中國大陸制度框架的制約，如：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不透明的決策過程、不獨立的司法檢察體制，以及不開放不自由的財產權制度、不給予農民平等公民權的城鄉二元體制等。只要制度因素沒有轉型或改革，任何政策措施或領導人意志都功效有限，從而由制度因素導致的官員腐敗、政策失當和民眾抗爭，也會叢生不窮。

群體抗議的星星之火尚未升溫燎原。但近兩三年來，不僅抗議事件急遽增多，單一事件的聚眾規模也越來越大，且牽涉執法人員(如公安、城管、保安等)的抗議事件日有增多。星星之火升級為乾柴小火，不僅燎原的風險升高，撲滅的成本也升高。2005 年以前，1 千人以上的群眾抗議事件，占全年總抗議事件的比例，都低於一半。但以 2006、2007 年群體抗議新聞事件為例，1 千人以上的聚眾抗議，約占了該年度抗議事件總數的 7 成，顯示不僅群體抗議事件增多，個別事件的參與人數也膨脹。因此，抗議過程中的不可控制因素會增高，執法者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升高，弭平抗議的行政成本和經濟補償也隨之墊高。

2008 年以來，股市急速下跌、房價仍高、物價飆漲，城市白領市民不若前兩年享受投資增值的快感，反而開始計算損失、失望沮喪，一旦城市市民的失落和怨恨開始擴散、瀰漫，不僅影響經濟消費，更會影響社會心理並激發集體行為，由此群體抗議發生的機會升高，失控的風險當然就更高了。

(三) 群體抗議的政治過程和後果

雖然群體抗議目前對中共統治正當性不構成立即明顯的威脅，但

是它們逐漸成為形塑政治過程的要角。當今中共各級政府的重要決策，往往不是一人說了算，而是經過相關部門與機構之間的權力競爭、利益競逐所產生的結果。在和諧社會的綱領下，集體抗議往往可以影響特定官員仕途、改變既定政策；它們有以小搏大的政治槓桿潛力，也影響既得利益的分配。例如，廈門反PX項目的抗議過程中，表面上是政府與群眾分據兩邊，但反PX化工廠的陣營，實則包括海滄房地產開發商的政商利益集團、國家環保部門、網路博客、環保知識份子加上抗議市民，這些同一陣線的行動者們各有動機、各有所圖。同樣的，上海磁懸浮延長線周遭的居民，散步集會反對該項工程，他們只是磁懸浮工程決策過程中的一個臺面角色，適可而止地演出、影響決策，但該項政策拉鋸戰背後，實則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不同部門與集團之間的權力與利益競逐。

當今中國大陸的多種群體抗議，反映了弱勢群體逼急而反的困境，而有限開放的政治結構、媒體報導和網路空間，給予抗議行動嶄新的機會結構。從而，群體抗議成為政治過程的一部份，它們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參與了部門機構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角力和利益競逐，構成新一輪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五、中國大陸農民工問題分析

清華大學吳介民副教授主稿

中國大陸自 1990 年代以來，由內陸移向沿海之跨省農民工持續增加；82% 的跨省流動人口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對於中國大陸之工業成長及臺商之勞動力供給至為重要。

由於國家政策、地方官員、資本發展之間的交錯影響，導致農民工在工資、勞動保護、社會保險、子女教育等多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

中共中央與地方雖嘗試改善農民工勞動條件，惟在農民工缺乏集體抗爭權的情況下成效有限；戶籍制度的桎梏與遷徙自由的憲法保障欠缺等問題根源若持續存在，農民工弱勢處境恐仍難改變。

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經過 30 年的發展，由廣大鄉村向城市移民所組成的「農民工」(簡稱「民工」)，已經成為藍領勞動階級中，最重要的一個階層。民工之特殊身分起源於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的城鄉二元體制以及至今仍然有效的城鄉戶口管理制度。鄉村居民由於戶口為農民身分，離鄉背井到發展地區尋找就業機會，而不具有當地戶籍身分，因此也被排除在諸多城市福利或新興工業化地區之鄉村集體福利之外。本文從民工的規模與特質、不平等待遇的現象與原因、政府的政策對應以及可能發展趨勢等方面，說明中國大陸民工議題的複雜特質。

(一) 民工的規模與特質

由於缺乏公開而完整的系統性資料，一般研究者很難確實掌握民工的數據。不過，根據中共官方的 1% 人口抽樣調查，2005 年，中國大陸人口中，流動人口為 14,735 萬人，占總人口約 11.5%。其中，跨省流動人口 4,779 萬人，占流動人口總數的 32% (中共國家統計局網站，「2005 年全國 1%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但是，另外一個官方的統計則顯示，跨省流動人口的比例高達 51% (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改革，「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2006)。所有跨省流動人口中，有 82% 被吸引到東部沿海地區 (4 省、3 個直轄市)；超過 60% 進入大型城市 (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改革，「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2006)。這些數據也證實了，從 1990 年代以來內陸向沿海大量跨省移工的趨勢持續在增加當中 (Fan, C. Cindy,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7 (2): 295-311, 2005)。

根據一份 2004 年的統計，民工主要的就業部門為製造業 (30.3%)、建築業 (22.9%)、服務業 (10.4%)、餐廳旅館業 (6.7%)，以及批發零售業 (4.6%) (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起草組，改革，「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2006)。其中製造業就占了將近 1/3，

由此可見民工對於中國大陸工業快速成長的貢獻。

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大陸加工出口的基地，也是臺商在中國大陸最為集中的地區。因此，民工對於中國大陸成長的貢獻，以及對於臺商之勞動力供給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表 1 顯示，外來人口占東南地區常住人口數極大的比例，而且在當地的城鎮勞動形成中占據多數地位，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廣東等省市。

表 1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民工占當地人口與城鎮就業之比重：2005 年

(單位：千人)

	當地人口數 [A]	城鎮職工數 [B]	外來人口數 [C]	外來人口占當地人口百分比 [D] = [C]/[A]	外來人口占當地職工比值 [E] = [C]/[B]
北京	15,380	9,204	5,688	37%	0.62
上海	17,780	8,559	7,067	40%	0.83
江蘇	74,750	38,777	10,897	15%	0.28
浙江	48,980	32,029	10,778	22%	0.34
福建	35,350	18,685	7,461	21%	0.40
廣東	91,940	47,021	26,552	29%	0.56

資料來源：計算自 2006 年「中國統計年鑑」，以及「2005 年全國 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表 2 顯示，私營與外資企業在雇用城鎮勞動力上所占據的絕對影響力。對於臺資而言，更重要的一層意涵是，由於臺商製造業在外資中占有的比重很高，因此也雇用了高比例、數量龐大的民工隊伍。因此，民工對於臺商企業的勞動供給，工資水平對於臺商出口競爭力之影響，在在牽動著臺商的利益，並且直接、間接衝擊到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例如，幾年前當一胎化的效應與其他因素開始影響廣東外資的勞力聘雇時，「民工荒」一時成為臺商熱門的話題。

表 2 中國大陸城鎮之工業雇用人口，按企業產權區分：2005 年

(單位：千人；括弧內數據為占總雇用數%)

	公營企業	私營企業	外資	臺港澳企業 占外資比重	總雇用數
全國	43,703 (54.9%)	16,921 (21.3%)	18,996 (23.9%)	49.7%	79,620 (100%)
北京	1,095 (70.6%)	147 (9.5%)	310 (20.0%)	26.3%	1,553 (100%)
上海	1,169 (38.2%)	517 (16.9%)	1,374 (44.9%)	29.0%	3,059 (100%)
江蘇	2,634 (35.1%)	2,428 (32.3%)	2,452 (32.6%)	38.9%	7,513 (100%)
浙江	2,087 (30.8%)	3,055 (45.1%)	1,626 (24.0%)	47.6%	6,767 (100%)
福建	768 (24.8%)	618 (20.0%)	1,708 (55.2%)	62.0%	3,093 (100%)
廣東	2,288 (20.4%)	1,833 (16.3%)	7,121 (63.3%)	68.8%	11,242 (100%)

資料來源：計算自 2006 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

(二) 民工的不平等待遇

民工之所以稱為民工，就是在於其作為國內移民之農民的戶籍身分特質。他們與國家所雇用的「職工」不同，不能享受國家所有的福利以及許多城市公共財的公平供給。因此而構成所謂的二元勞動力市場，部門間不均等的狀況極為突出。舉其犖犖大者，民工的平均工資，經過近似值的推估，只有一般國營部門職工的一半左右。這是全中國大陸的狀況。而在某些省市則更為突出，例如在北京，國營職工工資是民工的 2.7 倍，浙江和廣東都是 2.4 倍。

但是，其他非工資之不公平，也值得注意：民工普遍沒有受到勞動法規的保護。一般而言，外資部門的情況較好；臺資作為外資的一環，情況介於歐、美、日外資與內資廠之間；而私營內資廠，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民工幾乎是得不到勞動行政單位的切實保護。

社保的不平等也是最遭詬病的一個問題。中國大陸當前施行的勞動社會保險制度，設計於 1990 年代後期。從 2000 年代初期才較嚴格

地適用於外資。而一般私營內資則在地方官員的彈性執法下，能免則免。因此，民工的總體社保覆蓋率是很低的。根據一份官方資料，4種主要社保項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對於民工的覆蓋率，分別只有 26.6%、26.2%、15.3%、32.5%（中共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農民工生活品質調查」系列，2006）。這是總體的情況，如果我們扣除政府抓得較緊的外資企業，那麼私營內資廠的民工社保情況之差，就可想而知了。尚且需要注意，即使參與社保的民工，他們所參加的經常是專門設計給民工參保的低檔次社保，為減輕企業的負擔，所享受的給付權益遠低於城鎮職工。

此外，民工子女（「流動兒童」）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也是一大議題。發達地區的公立學校經常設立障礙阻止民工子女進入就讀，即使開放名額，也假借各種名義額外收費（例如借讀費、贊助費等等）。2003年，中共中央一份文件要求地方政府給予民工子女公平待遇，但是根據報導，以及實地田野調查，巧立名目以及歧視民工子女的情況並沒有根本改善。

從勞動力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民工不平等待遇是國家政策、地方官員、資本之間的制度與行為上的合謀所造成的複雜後果。直接講，對於民工的剝削，除了有利於企業，也符合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戰略以及經濟成長的目標。其中，戶籍制度扮演關鍵角色。因此，上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發展學者，提出以下的論點：

「過去 20 年中，戶籍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我們可以這麼想，在過去 20 年中，中國在製造業的帶領下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製造業成為世界工廠的一個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那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主要就是農民工，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在 20 年的如此長的時間裏，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過去的 20 年中把中國建設成這樣一個世界工廠。當然，這一成就的前提就是：做出犧牲的是中國的農民工，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農民工以他們的血汗、以他們的低廉工資，推進了中國過去 20 年、30 年的經濟改革，而造成農民工血汗工資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呢，就是因

戶籍制度而形成的城鄉二元格局。」(引自魏城,「中國農民工調查」,頁 112-113, 2008)

(三) 政府政策對應以及可能發展趨勢

民工在生活與勞動條件惡劣下謀求生存，在中國大陸廣泛受到注意。近年來，中共中央政府採取了若干政策，嘗試改善民工的條件。最值得注意的從 2008 年 1 月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這個新法律用意在於提高勞資雙方簽署正式勞動契約的比例，立意甚好。但是，一般的評價並不高。從資方而言，若是嚴格實施一定會在短時間內提高勞動成本。而像廣東高度依賴勞力密集出口產業的地區，地方官員則是罵聲連連，深怕外資撤走。許多大型企業(如華爲、中國 Wal-Mart)，則在本法實施前，即採取預防措施，例如先與資深員工解約再簽訂新合同；有的廠商則將員工辦理勞力派遣等方法而規避掉預期提高的成本。此外，從制度面來看，許多大量雇用民工的企業，尤其是私營廠，都沒有組織工會，因此，政府也無法有效介入監督勞動法規的執行。

此外，在提高民工社保覆蓋率方面，近年來地方政府加大對於外資的壓力，而使外資企業的加保率，確有顯著提升，但是就總體面而言，則改善的情況仍相當有限。這些情況顯示，中央的改革措施，若無地方的確實配合，並且在勞工沒有集體抗爭權的情況下，則必然難以推動。但是，中國大陸勞工的集體議價權，並沒有在法律上受到罷工權的保障，同時在威權政治結構下，勞工的集體行動也經常受到壓制或圍堵。目前，只有個別化的法律救濟行動被有限度地容許或鼓勵。尤有甚者，勞動運動者經常面對國家暴力與企業威嚇的雙重威脅。

民工制度不平等問題的最終解決，在於農民身分能否解開，戶籍制度對於人民的束縛能否放開，而在憲法的層次，則是人民的遷徙自由能否獲得保障。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拿掉了曾經一度明文保障的遷徙自由，因此 1958 年開始實施的「戶口登記條例」，目前是「合法地」管控人民的自由移動。沒有最終之憲法保障，農民工的自由權利是無法達成的，因此不平等的法律制度因素也將持續下去。

就目前情況觀察，中共中央沒有採取憲法層次改革的壓力與動機。

民工通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爭取自由與平等權的可能性如何？到目前為止，民工主要是通過「自力救濟式」行動，改善自身的處境。事實上，中國大陸農民的許多權利是自發行動逐步達成的，而後被政府追加承認，例如土地承包。民工目前享有的移動與移居的自由，某個程度上也是他們自己衝撞出來的，而經各級政府的調適與法規修改。至於民工採取集體抗爭的模式爭取權利並非少見，例如向廠商施壓討工資、加班費等。但是把抗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政策，則仍然罕見。最後值得一提的或許是，中國大陸公共建設不足所導致的系統脆弱性，可能讓國家在突發情況中失控。例如，今年春天因為雪災而導致的春運危機，即暴露出這種脆弱性。類似的事件，或許會促使中共中央採取某些預防性的政策，提升民工的生活與勞動條件。但是，中央政策調整是否有效，端視地方政府的配合程度。

總之，中國大陸民工的社經狀況看似與臺灣極為遙遠，但是由於臺灣資本在中國大陸之經濟結構連帶，其實是有著環環相扣的關連。因此，關注中國大陸民工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改善，也是關注臺灣自身政經發展的一個重要角度。

六、中國大陸中、小學課程改革初探

政治大學周祝瑛教授主稿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國中、小課程以統一模式為主，強調升學考試等人才篩選功能；2001年展開的第8次課程改革，則重視學生的學習模式、教材內容與生活經驗相結合，並推展校本課程以因應各地差異性。

課程改革實施多年來，雖逐漸改變過去的填鴨式教育，惟亦出現各級教師訓練不足、對新課程的認識不清等無法配合的情形，更引發課程改革理念及措施之辯論，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國

際上推展課程改革的議題與經驗。

(一) 前言

從 1980 年代起，美國、英國、澳洲等具有地方分權道統的國家，重新開始強調「國家基礎」、「國家標準」等政策，加強必修課程和提升學術性及統一性，課程上由分散、多樣走向集中、統一。同時，具有中央集權道統的國家如法國、中國大陸、蘇聯、日本等，則出現權力下放的趨勢，由集權、統一走向分權、多樣，加強地方和學校的運作，藉以提升課程的多樣性和靈活性(Levin, B., "Reforming education: From origins to outcomes", N.Y.: Routledge, 2001)。

在中國大陸，基礎教育包括從國小、國中到高中教育階段，是中國大陸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近 10 多年來中小學教育改革，包括進行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推展素質教育、實施新課程等(林新發、王秀玲，國民教育，「海峽兩岸義務教育政策演變和形成背景之分析」，2003)。其中 1999 年所提出的「科教興國」與「素質教育」政策，明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振興 21 世紀中國大陸基礎教育的重要基礎，具體提出改革課程體系和評鑑制度，成為推展課程改革的主要依據。

(二) 1990 年以來中國大陸課程與教材之特點

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的影響，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國中、小課程具有以下特點：1.課程發展以統一模式為主；2.偏重學科基礎知識與學生基本技能的培養；3.課堂教學過於倚賴教材；4.過於強調升學考試等人才篩選的功能。

因此，原中共國家教委(後改為教育部)於 1992 年頒發了新的課程計畫「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課程計畫(試行)」，並於 1993 年秋季開始執行。該計畫確立了由學科與活動構成的課程架構，學科課程以必修課為主，國中階段設選修課；綜合課分科，以文化基礎教育為主，適時加入職業技術教育，並增加藝(術)、體(育)、勞(技)學科及社會學科、自然學科的上課時數。

至於高中方面，1996年頒布「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畫(試驗)」，並於次年秋開始在江西、山西、天津三地試驗3年。其課程分學科類課程和活動類課程兩種，各占90.1%和9.9% (中共教育部網站，「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1998)。

(三) 2001年以後新課程改革

中國大陸於2001年6月公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共教育部網站)，新一輪課程改革正式開始啟動，展開第8次全國課程改革，同年發布國小、國中各學科的標準，並選擇若干試驗地區逐步推展。截至2005年，全中國大陸的國小、國中才全面推展新教材的使用。而高中則在2004年挑選了廣東、山東、海南、寧夏作為試驗區(陳善哲、王娜，21世紀經濟報導，「當新課程改革遭遇高考」，2007.3.9)。

歸納新課程改革有以下3大特點(鍾啓泉，比較教育研究，「中國課程改革：挑戰與反思」，2005；馬雲鵬，電大在線網站，「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背景與目標」，2005.6.16；高凌飈，亞太科學教育論壇，「中國科學課程的改革」，2004；李建平，中國教育報，「新課程結構應體現均衡性、綜合性、選擇性」，2001.9.26)：

1.重視學生的學習模式：第8次課程改革與過去7次課程改革的最大差別，在於從課程總體設計到課堂教學設計，都盡量朝向以學生為發展中心的目標，提供健全成長的機會，而不只是「教化」和「訓練」。將國文所占的比重由原來的24%降為20%至22%，將數學所占比重由原來的16%降為5%至13%，並將調整後的時數分配給綜合實踐活動(6%至8%)和地方課程(10%至12%)。

2.教材內容與生活經驗相結合：提倡確立兩種課程——學科課程與綜合實踐活動，以改變學習模式、發展學生個性為目標，透過學科知識與現實生活經驗來學習，嘗試打破道統的分科課程局限，提供學生知識與生活相結合的框架，國小階段以綜合課程為主，國中階段設置分科與綜合相結合的課程，高中以分科課程為主。其中，從國小到高中設置綜合實踐活動為必修課。

3.推展校本課程的教學研究：為了因應中國大陸各地的差異性與特色需求，因此，新課程增設校本課程，希望適應地區間經濟文化的

差異，符合地方、學校與學生的需求，透過「國家、地方、學校」三級管理，給地方和學校開發課程留有餘地與彈性。

（四）新課程改革評論

新課程雖自 2001 年公布，直至 2005 年秋季，中國大陸所有國小一年級和國中一年級學生才全部實施新課程，儘管實施期間不長，但已為基礎教育帶來相當重大的改變，影響各地學校。各級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學生的學習習慣正在慢慢轉變，尤其綜合實踐以及研究型的學習方法正逐漸為人所接受，改變以前的填鴨式教育，如今的英語、數學以及國文課本都比以前活潑很多，更接近時代和孩子的生活與經驗。這些變化在小學階段與都市、沿海地區學校尤其明顯（高凌飈，基礎教育課程，「課程改革實驗區學生學習方式調查」，2005。）。

不過也出現一些問題，如各級教師訓練不足、對新課程的認識不清，以致出現抗拒與告狀等無法配合的情形最為嚴重。因此，自 2007 年起，全面重新修正各師範院校的師資培育課程，包括頒布「教師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更新課程架構和內容，形成新的課程體系，建立教師教育質量評鑑制度等。因此，新課程改革將繼續帶來教材、教法、學法等方面的根本轉變（林新發、王秀玲，國民教育，「海峽兩岸義務教育政策演變和形成背景之分析」，2003）。

此外，與臺灣課程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在新課程改革逐步推展的過程中，中國大陸教育界出現了一場空前的學術大辯論，針對新課程改革的指導理念以及具體措施等方面進行不同的辯證。論戰一方是華東師範大學鍾啟泉教授，也是此次新課程改革中中國大陸教育界公認的主要人物，認為中國大陸基礎教育的唯一出路是從菁英主義向大眾主義轉型，中國大陸唯有積極推展新課程，別無其他出路。論戰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策三（王策三，教育學研究，「關於課程改革『方向』的爭議」，2006），他認為國中、小課程應該改革，但是新課程改革存在方向性的錯誤。一時之間各種回應文章紛紛出爐，且大多圍繞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知識和學習、課程和教學以及當前教育教學改革等核心問

題，進行激烈的論述（陳善哲、王娜，21世紀經濟報導，「當新課程改革遭遇高考」，2007.3.9）。有人將這兩種聲音歸納為「後現代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思想之爭（李耀宗，教育發展研究，「『發黴的乳酪』和『填不飽肚子的維 C』——評關於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一場爭論」，2005）。儘管這兩方人馬各有不同主張，但中國大陸新課程改革的確存在下列問題，亟需予以改善（鐘啓泉，杭州市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網，「新課改面臨的挑戰與反思」，2006）。例如：1. 高考（即大學考試）制度改革緩慢、影響新課程的推展；2. 教育立法與執行上的差距；3. 教師研究與培養訓練明顯不足；4. 新課程實施過程中缺少評鑑、追蹤與輔導機制，對於教育資源不足之內陸地區與省分，支援系統仍然不足。

（五）結語

誠如中國大陸學界對新課程改革的一句評語：危機引發改革，改革產生困惑。這句話其實這也是當今許多國家教育改革中所經歷的經驗法則。課程改革同樣是因為存在舊式課程無法適應新環境的危機。尤其是家長與社會大眾的理念、高中與大學入學考試與新課程評量模式的矛盾等，都需要一一加以克服（丁朝蓬，「中國中小學課程改革概覽」，2006）。

最後，相對於中國大陸第8次課程改革的5個方面：1. 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性課程；2. 發展人的主體性；3. 加強課程統整；4. 轉變課程設計模式；5. 強化課程研究，臺灣也是為了提升整體國民的素質和國家競爭力而推展「九年一貫課程」，從2001年起4年內全面實行新課程，包括5點特色：1. 以「基本能力」取代學科知識；2. 國小五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3. 學習領域的統整；4. 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5. 完整結合課程教學與評鑑工作，並包含「10項基本能力」及「7大學習領域」。

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臺灣也出現了如學童的數學和國文程度下降的隱憂、課程的銜接問題、與考試領導教學問題等。雖然中國大陸的新課程還包含高中階段，其複雜程度比臺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兩岸無論在課程改革的理念、形式、領域概念、評量、師資等遭遇問題都頗為類似，也可說相當程度的反映了國際上推展課程改革的議題與經驗。兩岸所推動的新課程，其所欲解決之途徑不但可作為

亞洲其他地區之參考，對於關心兩岸課程改革政策的訂定者與師生、家長，也都有一定的相互觀摩之效。至於是否會出現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國際課程改革鐘擺效應，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七、中國大陸的「溫州炒房團」

企劃處主稿

90年代末，溫州人集體投入大筆資金，在中國大陸各地炒作房價，「溫州炒房團」名氣漸開。

鑑於房價虛高對民生經濟之負面影響，中共中央與地方陸續以政策法規抑制房市炒作，「溫州炒房團」之目標亦逐漸轉向海外。

中國大陸商人對臺灣不動產投資頗富興趣，惟在兩岸法令限制下，目前操作空間有限，後續發展值予關注。

浙江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尤以溫州為最。據估計，溫州地區擁有5,00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民間資金(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8.2.1)。1999年以來，溫州人在中國大陸各地大量購買房產，集體投入大筆資金，炒作目標地區的房價，因此被稱為「溫州炒房(樓)團」。

所謂「炒房團」，其操作方式為集體大量購入房地產熱門城市的地標性產品，或是與建商達成某種默契，從而影響消費者的價格預期，刺激場外資金跟進，迅速拉動房價上漲，然後尋找合適的機會拋出，牟取暴利(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7.12.27)。類似的操作，還有「山西炒房團」、「深圳炒房團」等，但以「溫州炒房團」最早，名氣也最大。

炒房行為讓一個城市的房價在短時間內突然飆升，導致房價虛高，也影響物價與民心。因此，近年中共國務院針對城市房價高漲，連續制訂多項法律與行政措施，炒房行為受到壓制。「溫州炒房團」開始將目標轉向海外，由於我政府有條件開放陸資，臺灣也成為炒房團投

資目標之一。

（一）「溫州人經濟」

溫州人向以善於經商聞名。1970年代中，文革結束不久，溫州人即出現在各地從事修鞋、修鐘錶、換糧票等小生意，只要能賺錢的行業，就能看到溫州人。1980年代，改革開放才開始，走私與仿冒即成為溫州新的財路(劉振墉，2007.11.22)。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溫州經濟快速發展，以「溫州模式」(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高成長)著稱，民間資金快速累積。尤其特別的是，相對於其他沿海地區受惠於外商(及臺、港商)的投資而發展，溫州歷年累計的外資，不過10餘億美元，基礎設施條件也不如其他沿海地區，卻仍創造中國大陸最活躍的地區經濟(包松、陳湘舸，2004)。溫州商人也擅於闖盪大江南北，估計在外地經商的溫州人約有200萬人，其所組成的各種行會組織，已是中國大陸民間相當重要的商業組織。

龐大的溫州民間資金，在各地進行各種投資、民間借貸以及投機炒作等活動。各界褒之以「溫州財團」，貶之則稱「溫州炒團」、「經濟蝗蟲」(世界日報，2007.5.26)。

（二）溫州炒房團

「炒房」的風潮最早是從溫州人自家門口開始。1998年至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金進入本地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市區房價從2,000元人民幣/平方米左右，飆升到超過7,000元人民幣/平方米。一度造成溫州當地房地有行無市，無房可炒。

1999年，溫州民間資金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產市場。2001年8月，「炒房巨鱷」一戰成名，以5,000多萬元人民幣，3天買下100多戶房產，使上海大樓的價格一夜之間上升1/3(世界日報，2007.5.26)。之後逐漸轉戰中國大陸各地，大小城市都可以看到「溫州炒房團」的出現，除在新疆和廣東略有挫敗外，幾乎無往不利(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5.7.7)。2003年至2004年，「溫州炒房團」及其挾持的1,000億元民間游資在中國大陸各地房地

產市場上的表現，開始受到全國性媒體的注目，「溫州炒房團」一詞正式出現(中新社，2004.3.25)。

早期炒房團的成員多是民營企業主的配偶，「太太炒房團，買樓如買菜」，如今炒房已幾乎成為溫州的全民運動。業界預估，在各地炒房的溫州人多達10萬人，溫州人雖不及山西煤礦老闆富有，但採取團體作業，絕不單打獨鬥，團體購房有容易殺價、折扣高、資訊來源廣及集體智慧判斷等優勢(聯合報，2006.5.21)。

「溫州炒房團」的投資特點如下：

- ▶有錢大家賺，一人賺錢，眾人跟上。炒房之外，也炒煤、炒棉等等，形成所謂的「溫州式投資」現象。而溫州人對市場的敏感度，更成為中國大陸投資的風向指標。
- ▶財大氣粗，上千萬元人民幣現金也1次付清。
- ▶團隊合作，1次買下數10戶，甚至整個建案，待催高房價後，再分批出售，獲利了結。所以被稱為操縱樓市的「炒房巨鱷」。

(三) 海外炒房

2004年成名的「溫州炒房團」，因為樹大招風，成為中國大陸房市上漲的過街老鼠，所到之處人人喊打。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都制訂針對炒房行為的地方法規，中共國務院也對房地產業加強宏觀調控。炒房利潤空間縮減，溫州的民間資金開始轉向海外房地產業，「溫州炒房團」開始出國炒房(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05.4.25)。

- ▶美國紐約有「第二中國城」之稱的法拉盛地區，大多數新蓋的住宅房屋都是溫州人所投資；紐約長島也有溫州人買下數百萬美元的豪宅別墅。
- ▶溫州僑民聚居的巴黎，許多溫州人透過親戚關係買賣房地產。
- ▶近年經濟快速發展的馬來西亞、越南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也吸引許多溫州人投資。
- ▶2007年10月，在中東杜拜收購電視臺，以及「世界島」中的上海島。

(四) 溫州炒房團與臺灣

中國大陸商人對臺灣不動產一直有濃厚興趣，以專業交流或觀光為名，到臺灣看房、考察市場的人絡繹於途(「你好臺灣」網站，2008.2.27)。但由於法令限制，目前還只是「看房團」，還沒有成為「購房團」(環球時報，2006.5.23)。

2002年我政府通過「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有條件開放中國大陸民眾購買臺灣不動產。雖然目前只有4件審核通過，但已吸引「溫州炒房團」的注意，準備在兩岸進一步開放後大展身手。

臺灣開放第2、3類大陸民眾來臺觀光後，溫州人以觀光為名來臺灣看房地產，已是公開的秘密。臺灣某旅行社2006年承攬10幾個看屋團，半年不到就有上百個溫州人來看過臺灣豪宅。房地產業界也傳說，實際上有不少擁有第3國護照的中國大陸人民已在臺灣置產(聯合報，2006.5.21)。

今年3月初，國內房地產業者在上海、杭州對920位上海、浙江商會富商、企業主與EMBA班高階經理人(其中不乏「溫州炒房團」成員)，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在523份有效樣本中，7成受訪者對投資臺灣不動產有興趣，平均可投入資金為新臺幣5,000萬元；最感興趣的產品，依序是土地(34%)，辦公大樓(22%)、豪宅(19%)、店面(17%)，觀光飯店僅占8%。而投資房地產目的，排行第一是賺取價差報酬(44%)，其次是出租(27%)、商務(17%)、自用(11%)、其他(1%) (經濟日報、工商時報，2008.3.13)。

4月21日，號稱「富豪團」的9位中國大陸商人來臺考察房地產，被媒體大肆炒作，雖然考察團成員一再強調，關心的是「城市發展」與「觀光產業」，而非「溫州炒房團」，但是仍然造成許多爭議與討論。事實上，在兩岸政府對於陸資來臺，都仍有許多法令限制的狀態下，類似「溫州炒房團」的手法，目前操作空間極為有限。但日後如政策開放陸資來臺，對於臺灣的影響，可能就不只「炒房」而已。